

1805

城步文史

第一集

就以手册尔為貴，遠道有紀念。
來記為鄉有國家、族、政治、文化、思想
幾大方面，活了九十年，若被
下一天，雪泥鴻爪吧！

湖南城步縣沙坪頭人

陳鶴泉

政协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于常青

城步文史资料

第一集

(内部资料)

20123/08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封面题字：李德文

责任编辑：唐芳耀、刘志阶

校 审：刘汉、李德文、唐芳耀、杨传梁、李春莲

**检 字：李虹、罗荣、王绍声、李晓莉、陆小花、
蓝支维、钟楚平、陆小菊**

城步文史资料（第一集）

政协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城步苗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刷

湘城文准（1989）6号

1989年11月印刷

工本费 元

邮政编码：422500

前 言

城步苗族自治县文史资料第一集出版了，这是我县各族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继《城步苗民起义资料》等三册专辑后又一重要资料。它是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诞生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编印和出版文史资料是周总理生前倡导的、中央很多领导同志反复强调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并已载入全国政协章程。编写出版文史资料，可以把我国近百年来，特别是历史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保存下来。这种史料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有辅于历史研究和教学，也可以用它来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让他们熟悉乡土史，热爱故乡，发扬故乡各民族人民艰苦创业、团结战斗的优良传统，激发大家的革命热忱，自觉地出力献策，加速两个文明建设。它也有利于团结各界人士，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发展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我们的这个集子就是根据这一精神编辑而成的。

城步苗族自治县，历史悠久，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名士辈出，人才荟萃，又是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三亲”史实盛广，内容丰富。本集收入的，仅沧海一粟。现代人物只收集两三人，其中段梦晖先生系解放前全国闻名的新闻人物，他对湖南和平解放，对《湖南日报》的创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段先生已作古，他留给后人的回忆录，确系难得的珍品。在本集《史海勾沉》中，还介绍了李蛮牛等几位县官，配合当前廉政建设，借以告诫干部们：个人的忠奸功过，有待“盖棺论定”。

这样，可激励大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此外还刊出了地方风物几篇文章，一看，就知道城步是块宝地，无奇不有，无宝不藏。

本集文史资料，虽事先走访了当事人或其亲友，对史实作了核对，但资料编成后，来不及一一反馈；加之编者水平，笔错墨误，在所难免，诚恳地请读者指正，以纠错讹。

编 者

1989年10月26日

城步文史资料目录

前 言 编 者 (1)

近代人物

- 段梦晖回忆录 段梦晖 (1)
初创时期的《新湖南报》 李 锐 (8)
段梦晖与湖南《中央日报》 谌 震 (11)
团结战斗迎接《新湖南报》的诞生 柳 思 (21)
我与段梦晖先生相处的日子 戴 翼 (25)
段梦晖逝世追悼词 (27)
我的自传 陈鹤泉 (29)
剿匪回忆录 肖 雀 (37)
版画家邹洛夷 刘汉、唐芳耀 (53)

解放风云

- 江南别纵队大事记 刘志阶 (56)
城步解放初期建政情况 肖尊田、钟胤进 (64)

史海钩沉

- 城步建置沿革 张正清 (69)
诸葛城史话 魏人栋 (73)
宋代抗金名将杨再兴籍贯考 刘志阶 (75)
儒林书院 杨进廉 (80)
廉明的县官李蛮牛 刘期劲 (81)
热心城步教育事业的县长王强毅 易必让 (84)
杨文开

地方风物

- | | |
|--------------|-----------|
| 城步银杉 | 段志强 (88) |
| 神奇的虫茶 | 尹建德 (90) |
| 城步苗乡的奇鱼怪龟 | 唐芳耀 (93) |
| 龙头竹 | 刘志阶 (95) |
| 湖南参 | 刘志阶 (96) |
| 梨膏 | 刘志阶 (97) |
| 香辣椒 | 杨传梁 (98) |
| 城步政协成立十年来的回顾 | 唐芳耀 (101) |
| 文史资料征稿启事 | (107) |

段梦晖回忆录

1907年1月15日，我出生在湖南省城步县西岩市许家山村一户汉族地主家里，取名怀瑜。父段光珍，武庠生；母杨兰英，苗族。

我于1913年开始读书，学名安全（庵旋）直到十四岁；断断续续读了四年私塾，在邻县武冈读了两个月的国民小学。我从七岁起便要侍候父母，做些家务琐事。虽然家里雇了两个种田的长工，但农忙季节，我就要帮助看牛，做力所能及的事。

1921年父亲死了，经母亲同意，送我赴长沙读书。1922年上期在大麓学校补习，下期考入高等工业学校附中。1923年下期转学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先后读了三年。至1925年我任一师学生会工运部部长，两次指挥游行队伍参加全省性示威游行，一次是纪念“五卅”惨案；另一次是纪念孙中山。两次游行均由长沙县师周以栗领导，周后来是武昌农运讲习所的秘书，代理过当时毛主席的职务，是一名很正直的共产党员，我很佩服他。1925年由城步旅长学生推举我主编过几期《城步旬刊》，主张打倒帝国主义，迎接国民革命。公开反对赵恒惕政府及其基层力量——豪绅盘踞的团防局。同年，我经同学邓成云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邓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邓在武冈牺牲。同年我还把在一师搜集的进步人士苏曼殊的遗作汇编成册，定名为《燕子山僧集》寄上海出版，这是我文学上的残留鸿爪。

1926年7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保送我去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不久由燕塘开往东莞驻防，成立连党支部时，我被选为常

务委员，见习排长。交叉党员焦桐（湖北黄陂人、四期学员）为宣传委员。12月我和焦去黄埔军校参加特别党部改选会议，由原特别党部干事刘某（忘记名字、三期同学）、甘竹溪（四川人、四期同学）主持。我当面反对李济深派来监选的曾养甫，贾伯涛妄图推迟开票的作法，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和支持，从而赢得了选举的成功。

1927年3月，我们仍回驻燕塘，4月14日早晨，蒋介石爪牙以“清党”为名搞反革命政变，大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焦桐是交叉党员，在搜捕之列，幸而我先一日得到这一消息。焦却去广州未归，我便去黄花岗车站等他回连队。他一下车，我向他透露国民党“清党”的消息，并告诉他去中山大学找我的同学朱锡紫取用我寄存的两套便服，改装去香港避难。因此我也成了“清党”对象，只得离开黄埔军校回到老家城步。

1927年9月，我在家乡参加了城步县的行政会议，会议期间我担任过执行主席，作出过查封土豪劣绅肖庆藩、祝澄清等人财产的决议。在这个会上，成立挨户团常备队，县长兼主任伍宗汉为副主任，我被选为常备队队长。挨户团常备队本来是农民武装，由于伍宗汉和我都出身于地主家庭，使农民武装严重不纯。同年9月底我正式到职出任常备队长，月薪8元，干了三个月，到年底离队回家。这年11月，打着拥蒋反共旗号的廖湘芸匪军潘旅窜来城步县城，毫无纪律。我便率挨户团常备队140人进逼县城，并下达了攻城的书面命令。潘匪虽有千余人、四百多条枪。但他恐在人生地不熟的万山丛林中对己不利，终于被迫撤退。但我下的攻城令却落到肖庆藩的手里，成了后来控告我为“暴徒”的罪证。

1928年4月，刘建绪大举清乡，派兵围捕我和我的堂兄段公爽。公爽于1926年由长沙回县搞农运的。在“清乡”时，

由于伍宗汉向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军告密，出卖了我们，把一年多以来查抄土豪劣绅的家产的责任全部推在我一个人身上，致两次派兵来围捕我。段公爽被迫逃赴南京，考入《京报》当助理编辑。随后我也被迫离开城步，七月我也逃到南京段公爽处。十月在国府警卫团当眷写员约两月。十二月到《京报》代段公爽任助理编辑。这是我进入新闻机构的开始。

1929年12月，石信声改组《新京晚报》为《新京日报》，我任总编辑。1931年8月湖南伪军政机关追捕我的通缉令发到南京，指控我为“暴徒”，因而在南京被逮捕。十一月经李济深出面保释出狱。出狱后任《新京日报》总编辑。1932年夏，陈立夫派伪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大学教授杨公达率领他的所谓学生前来搜查《新京日报》，受到石信声的抵制。1934年春，我因母病回城步。直到1935年秋才返回《新京日报》。这时的《新京日报》销数大减，旧人星散，如编辑邵季昂原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在武汉办过《国际返讯》，因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逃到南洋。1931年回国，1932年仍回《新京日报》工作，王闻识，广西人，青年，我的助理，后来是共产党员，牺牲于上饶集中营。以上这些同人均去职，使我很难受。加之经费困难，职工生活不安定，我撑至1936年夏就病倒了。

我于1936年4月脱离《新京日报》，没有找到工作，靠借贷度日。直到8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派该报主笔兼秘书周帮式找我，邀请我到该报工作，名义上是编辑部副主任，月薪150元。当时我失业已四月，生活很困难，只得应聘。后我获悉周帮式是国民党C C分子，1964年偶尔在北京知道他的下落，曾向组织检举过他。

我在《中央日报》任职后，一遇机会，就宣传抗战。一次我接到中共中央从天津寄来两个文件，一个是：呼吁全国爱国人

士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制止内战；另一个是：呼吁正直的国民党党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力主国共二次合作，联合抗日。这些文件给了我前进的方向和力量。

1936年11月，苏联大使馆邀请我参加十月革命节。南京新闻界被邀者只有我和国民党中央社的一位英文采访。第二年，（1937年）增加了一个肖同兹（伪中央社社长）。后我和张西曼教授做过联苏抗日的宣传工作，如放映过苏联卫国战争方面的电影。

双十二事变发生及其以后的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一方面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南京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主和派的汉奸嘴脸；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毛主席对国事主张的英明和伟大。主战派从此也更加活跃。当时蒋何之间的矛盾，确实很尖锐，我亲自经手办过一件事，可资说明，宋美龄由西安飞回时，曾携带蒋介石给何应钦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此间正在磋商和平解决问题，请勿派飞机轰炸西安云云。宋想到何收信后，仍会派飞机轰炸西安，借机炸死蒋。所以宋将信先送《中央日报》发表，然后才交何。这是当时历史的真实。

1937年七七芦沟桥抗日枪声打响了，接着爆发了轰动全球的“8·13”淞沪抗战，汉奸汪精卫的秘书黄濬被枪决，说明南京确在被迫走向抗日，我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感到很兴奋。不久程沧波、杨杰去欧洲，我坚持工作，至12月南京撤退的前十天（即二日晚上）才离京赴汉，同时脱离了南京《中央日报》。

1938年初我回城步闲居至9月，程沧波由欧归来，电邀我赴长沙参加《中央日报》工作。我工作了约两个月，因母病回乡，再去时，途中闻长沙大火，又返回。

1939年我在家乡住到7月，做了两件事：①招安了一股

为土豪劣绅收买和利用的土匪，②、商请一个乡长出面申请县政府取消对我的通缉令。嗣后随即赴渝。在无法找到工作时，我又去看望程沧波，见面后。他就请我去邵阳接办《中央日报》，1939年我去邵阳接办了《中央日报》。该报是长沙大火后仓促筹备出版的，设备差，经费补贴每月仅500元，当时又只出四开张，销数少，困难重重。我到职后，一面扩充篇幅，改出一大张；一面报请辞职，均未获准。其后销数达四千多份，收入较好，勉强可以维持下去。后来每年春秋两季招登广告收入多，经费才较充裕些。

1943年7月，《中央日报》改为国民党中央宣部直属党报。

1944年6月，日寇进抵安化马迹塘，距邵阳只有一百八十华里，邵阳国民党党政机关仓惶撤退，《中央日报》后撤至武冈，同年冬再撤至安江。

我在《中央日报》工作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1940年初，揭露了汉奸汪精卫叛国投敌。

1941年重庆发生《皖南事变》的消息，全文照登，不几天又收到刊登有周总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题字的《新华日报》，本想复制转登，由于缺乏复制设备，未能实现。

1940年，我在耒阳会见薛岳，他当面给我五千元，我给《中央日报》二千元，其余的给了家乡办达时小学。

1941年，我在南岳经同学介绍，为解决办报困难，与衡阳《大刚报》的社长毛健吾一道，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听了我的反映，回渝后，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寄来五万元给《中央日报》作添置器材开支。

1943年赴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学习了25天。

1945年夏在安江还出版过几期《中央日报》航空版，委托芷江空军人员代为在武冈、邵阳、城步等地散发，宣传国际反

法西斯的大好形势，鼓舞敌后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6年《中央日报》在长沙复刊的同时，我又在邵阳创刊《昭报》，日出四开版一张半，系廖耀湘，周盘合资办的私营报纸，出版至50多期，因转载重庆《新华日报》社论而被国民党邵阳专署勒令停刊。当时我不能抽身负责，委托民盟成员李幻如为代表，参加工作的还有共产党员孟树德兄弟俩、傅白芦、蒋牧良等。孟、蒋后转到《中央日报》工作。

1947年《中央日报》揭露了国民党邵阳专署一手炮制的“永和金号惨案”，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在邵阳的爪牙孙佐齐，使特务、杀人犯傅德明得到了处以极刑的下场。

同年我回城步与戴国璋竞选国大代表，在省府刘公武的支持下，获得竞选胜利。

1948年春，《中央日报》刊登了湖大五教授撰的反对省主席王东原在长沙修建外围地下堡的公开信，并刊登支持这一主张的专文，挫败了王东原毁城的阴谋。与此同时，大量刊登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的文章。为迎接湖南和平解放拉开了序幕。

1949年4月，我们《中央日报》坚决主张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八条进行和谈，并参予反对桂系军队破坏和平解放湖南的斗争，直到彻底胜利。

在《中央日报》时，因日寇犯境逃亡和迎解前后曾得到各界进步人士和地下党的支持。如岳森，邵阳人，曾任国民党第二军军长，解放后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刘公华，武容县人，原任湖南省政府秘书，解放后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左恭，共产党员、湘阴人；等等。这些同志曾在我遇到困难时，给予大力支持和援助。特别是1949年5月，我支持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起义工作，地下党派柳思同志前来《中央日报》加强领导，因此我被桂系部队逮捕。湖南人民团体在党的策动下，准

备在长沙市实行罢工、罢市、罢课声援我。陈明仁将军出面极力担保，在我被扣押 70 多小时后，终于得到释放，恢复了自由。

1949年和平解放湖南后，我把长沙《中央日报》全套设备、厂房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不久程星龄同志来访，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出任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我当时表示难以胜任，从此，我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整 理：唐芳耀

初创时期的《新湖南日报》

李 锐

长沙《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宣部直接管理的一张报纸，在湖南有较大的影响。社长段梦晖，是我在第一师范的同学。他对中共宣传若即若离，对国民党各个派系都采取应付的态度，对中共和进步人士也有所接触。蒋牧良一九四六年曾在该报担任过副刊编辑。孟树德也在该报担任过采访主任，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离开。他们在报社工作都没有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因为在里面起作用，该报在副刊和地方通讯版上刊登的文章，反动的东西较少，有时还能登出一些进步的东西。而在国内新闻方面则完全采用中央通讯社的电讯，基本上都是反动的。一九四九年初，将军在淮海战役中遭到惨败和蒋介石元旦文告发表后，该报的态度才开始有较大的转变。如一九四九年一月程潜下令停止征兵，《中央日报》和长沙其他一些报纸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这个消息。这是长沙新闻界第一次对湖南和平运动采取的一个积极姿态。

一九四八年秋，我在处理南岳国师行动之后，为了使社会人士视我为教育部的督学，便于掩护自己的活动，并对有些人诬蔑国师纠纷是共产党搞起来的这不实之词加以驳斥，有意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处理国师纠纷的文章。从这时起，我开始与段梦晖接触。一九四九年一月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央日报》态度的开始转变，我奉省工委之命，要雷雨田向段梦晖提出，省工委要派人进入报社工作。段不仅同意，而且要求派个总编辑来主持。我将这个情况及时向省工委汇报，

周里指示：同意派人进报社，但不要当总编辑。因为这个报纸是国民党中央办的，不可能把它办成共产党的报纸。担任总编辑，有些问题我们的同志不好处理。省工委随即派柳思到《中央日报》去，主要任务搜集各方面的情况供党组织参考。段为了使柳思的工作方便，将他派到电台工作，收听延安新华社的电讯和“美国之音”的广播，除供给省工委参考外，择其可以发表的，作为该报南京、上海、香港等地记者的“专电”予以刊登，用以打破中央社对各报电讯的垄断，推动长沙各报对湖南和平运动的报道。柳思在报馆工作期间，还先后与赵光白等同志吸收了一些进步分子入党。

由于《中央日报》的新闻报道摆脱了中央社的控制，改头换面刊登了一些新华社的消息，在言论上也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白崇禧在武汉看了报纸后大发雷霆，对唐星说：“程潜在湖南到底搞什么名堂？报纸天天鼓吹和平，替共产党做宣传！”长沙绥署参谋长刘嘉树等也向白崇禧密报段梦晖与共产党有联系，他们搞的新闻界的黑名单中竟将段列为第一名。白崇禧的先头部队到长沙后，夏威即派人接管《中央日报》，借口报纸刊登了一则香港电讯，说李宗仁将从香港来湖南，指为该报造谣，将段梦晖逮捕。事情发生后，长沙新闻界一致抗议，各报纸停刊一天。段被监禁几天，经我党营救，获得释放。白崇禧到长沙后，召集各界座谈会，大骂《中央日报》，并撤去段的社长职务，由省府秘书长杨绩荪接管。可是，长沙各报社和人民团体纷纷去电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挽留段梦晖。白崇禧更大发雷霆，说撤换一个报社社长，居然有人电中央挽留，湖南的情况真不可理解。这是指桑骂槐，指责程潜。后来杨绩荪终因群情愤慨，加上形势的迅速发展，对他们不利，也不敢接管了。

段梦晖除了支持和参加湖南和平解放运动，掩护我党派在报社工作的同志外，还先后拿了几笔钱由柳思转交我党作活动经费，又送了一些纸张给我们作印刷宣传品之用，还发给省工委派往外地工作同志的“特约记者”聘约，以掩护他们的工作。

《国民日报》是湖南省政府的报纸。一九四六年春，地下党员黄明、刘国安、邓钧洪、王蔚琛、汤健民、官健平等同志先后进入了这个报社。先后担任社长的吴启颜、邓虚都倾向进步，支持和平运动。唐生智发起组织“湖南人民自救会”时，这个报纸做了一些宣传。白崇禧逮捕《中央日报》社长段梦晖后，长沙新闻界在《国民日报》社开会，刘虚主持会议，决定各报停刊一天，以示抗议。当晚白崇禧的爪牙杨绩荪将刘虚撤了职，勒令移交。该报员工在地下党的同志领导下，推派代表向杨提出质问，杨只说报纸销路很差，其他无词对答。派去的新社长也不敢进入报社接事。黄维国（省府委员，青年党头目之一）勒令该报迁移邵阳，受到报社全体职工的抵制，终于保存了所有器材，解放后移交给人民政府。

在回顾《新湖南报》的创刊经过时，不应该忘记原国民党湖南《中央日报》社社长段梦晖先生的贡献。段先生今已作古，他是一位有爱国心和进步思想的老报人，在他主持的报馆里先后有好几个党员活动过。解放战争期间，他主动找党的湖南省工委取得联系，并协助程潜将军的起义活动。长沙解放后，湖南《中央日报》由《新湖南报》接收。我们的交接是在徐长兴饭馆非常友好地进行的。在原《中央日报》经理部和工厂许多职员和工人的协助下，段先生将全部机器设备、房屋、纸张等各项资财，完整地移交给我们，这样就在物资和技术方面为《新湖南报》的创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邓镇汉摘自纪念《湖南日报》创刊三十五周年专辑）